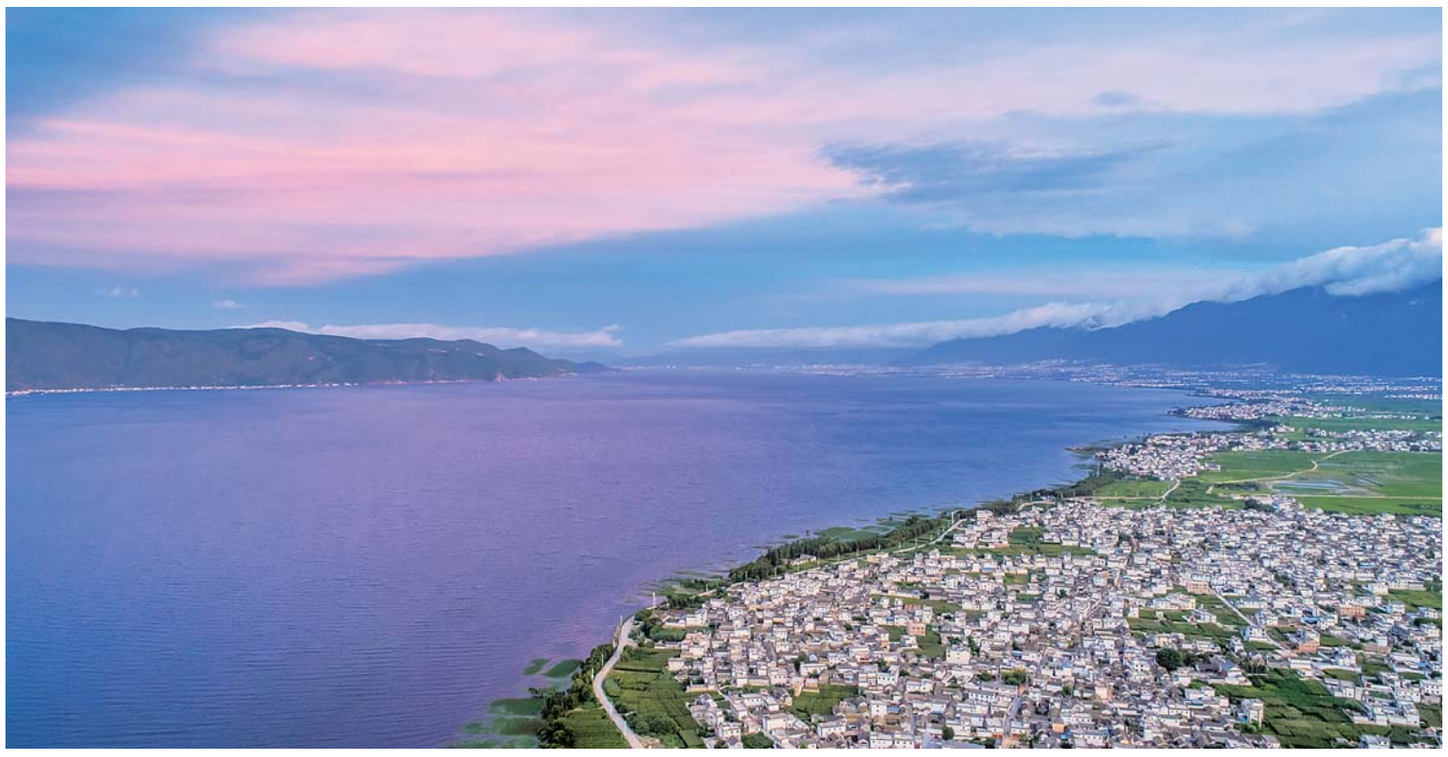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攻坚，为了美丽中国



▲这是云南大理洱海一景（2018年7月5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胡超摄

通顺河「通顺」记

新华社武汉2月27日电（记者皮曙初、杨依军、李劲峰）全长191公里的通顺河，起于汉江，流经湖北潜江、仙桃、武汉三地，最后汇入长江。**虽名为“通顺”，却长期“不通不顺”**：受工业污水影响，从源头流出10多公里，水质从Ⅱ类直接恶化到劣Ⅴ类；遇到上游排污，下游就关闭交界处闸口，将污水堵在上游，引发上下游冲突……

针对水质每况愈下、跨界矛盾突出、群众投诉不断的“水流不通”“治理不顺”矛盾，湖北在通顺河率先推行河长制。**短短一年多，这条黑水河、断头河就变清、变畅**……河长制何以如此立竿见影？

上游排污下游“埋单”

位于潜江与仙桃两地交界处的深江闸，是一栋蓝白建筑，6道闸口控制通顺河流速流量。河水流过深江闸口，分南北两支流入仙桃腹地。往年，一到春夏时节，所有闸门就会死死关闭，流动的河水在这儿停滞，通顺河被“拦腰截断”。

“关闸也是迫不得已。”位于下游的仙桃市一位干部坦言，通顺河在潜江境内10多公里，水质就从Ⅱ类直接恶化到劣Ⅴ类。仙桃上百万亩耕地，50多万亩水产，大部分农业、工业用水都要靠通顺河，“来水被污染，吃亏的总是下游。”

仙桃市郑场镇游潭村村民袁传军家在通顺河深江闸旁。他回忆，过去通顺河河水清澈，不仅能钓鱼，还能下河游泳。但自从上游工业园区发展起来后，**河水越来越黑，下游养殖户换水就会大批死鱼**。

“一看到上游来污水了，深江闸马上关闸，而且一关就是上十天。”袁传军说，河水被憋在闸口，没法流动，就发黑发臭，熏得周边居民窗户都不敢开。

作为上游的潜江市经济开发区石油化工、纺织等工厂林立，也是主要排污源。潜江市一位干部坦言，过去追求经济发展速度，污水处理等配套系统并未跟上，部分污水直排通顺河。下游一关闸，原本能通过流动自净的河水变成死水，愈发污染严重。

湖北省环保厅污染防治处处长朱津桥说，通顺河水系分布呈现纺锤形，流经区域都是江汉平原人口密集、经济活跃地区，“**通顺河跨界污染困局，在江汉平原上非常有代表性**。”

统一调度“休养生息”

2017年，湖北省推行河湖长制，从省到村明确通顺河五级河长。

“**跨界河流 不通不顺**”，**根子在于规则不清、责任不明**，上下游、左右岸、水上水下相互推诿扯皮，致使河流生态、防洪、灌溉等功能被严重分割和弱化。”湖北省副省长、通顺河河长曹广晶说。

通顺河共有16座涵闸、4个泵站。长期以来，各个闸泵调度权分散各地，频频出现各自为政、相互扯皮、条块分割等问题。湖北省首先将闸泵调度权上收，实行流域统一综合调度。

在各级河长协调下，环保、水利部门经过多方协商与科学测算，建立通顺河流域联合调度机制。在丰水、枯水期不同条件下制定各涵闸的精细化调度方案，确保通顺河日常30立方米/秒的生态流量，先让水动起来。

湖北省水利厅水资源处副处长江浩说，通顺河流域在全国率先探索水资源和水生态的联合调度，使过去分散式、应急式调度模式更加系统化、精细化，“在确保防汛安全基础上，为河流提供休养生息、生态恢复的生态基流。”

责任不清，是跨界河流常常出现“上游污染，下游埋单”等问题的核心。推进河长制过程中，环保部门在通顺河上下游交界、干支流交汇等重点区域，共设置5个断面监测点，实现河流水质24小时自动检测，每小时更新水质监测数据。

仙桃市副市长李少云介绍说，以前上下游水质监测各干各的，监测数据相互不认，现在联合监测，定时通报，实现以监测断面划分上中下游各河段“责任田”，以水质数据直接反映各河段污染防治成效。

铁腕治污水清河畅

破解河流污染，重在铁腕治污。湖北省环保、住建、水利等部门对通顺河各个断面水质监测数据，设立“逐年改善”的考核目标，要求到2022年全部达到Ⅲ类水体。

对于考核未达标的区域，实行环评限批。仙桃市辖区内的挖沟泵站断面2017年水质不达标，包括仙桃市新材料产业园区在内的流域范围整体被环评限批。

精准考核目标之下，上下游地区纷纷铁腕治污。2017年以来，潜江市共投入超过6亿元用于通顺河沿岸治污，关停11家排污不达标企业。仙桃市、武汉市蔡甸区也关停沿河600多家养殖场。

潜江市筹资1.16亿元建成污水处理厂，收集处理开发区园区工业污水。记者在现场看到，8家企业污水全部明管直连到新建的污水处理厂。**从污水处理厂摄像头上，各家企业废水排入量，处理后排至通顺河的水质情况实时监测，一目了然**。

一年多来，通顺河水环境与水生态发生巨大变化。湖北省环保厅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底，通顺河5个考核断面中，4处水质均从2016年的Ⅴ类或劣Ⅴ类提升至Ⅳ类，总体考核达标。过去矛盾集中的深江闸断面，水质也稳定达到Ⅲ类。当地村民说，去年再没看到关闸挡污，“河水流动起来，这条河真正通顺了”。

潜江市委常委、通顺河潜江段河长董方平说，**通顺河从黑水河、断头河，变绿、变畅的探索表明，依托河长制平台理顺调度、划分责任、强化考核后，河流跨界污染、上下游冲突难题就能迎刃而解**。

（上接1版）一个个资源型城市，一片片重工业聚集区，高耸入云的烟囱，直上青天的浓烟……

那是一个时代的印记，更是我们曾经的自豪。

只用了半个多世纪，中国就走过发达国家两三百年的工业化历程。然而，在历史性的发展跨越中，环境问题也集中爆发。

聚焦到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会发现，中国经济“第一阵营”里的这三个版块，也曾是污染最集中的三个区域——

只占国土总面积的8%，却消耗了全国42%的煤、52%的汽柴油，生产了全国55%的钢铁、40%的水泥，单位面积污染物排放量是其他地区5倍多。

伴随企业壮大、城市扩张的，是一条条黑水沟、一汪汪臭湖水。2007年夏，太湖爆发水危机。大量污水排放导致水体富营养化，蓝藻水华浓得化不开。无锡等地湖水恶臭、水厂关停、市民疯抢矿泉水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岂止太湖？

沿江南水乡溯长江而上，洞庭湿地、江汉平原、三峡库区、巴山蜀水，所经之处，生态系统千疮百孔——

近30%的重要湖库富营养化；

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

废水、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分别占全国43%、37%、43%；

干线港口危险化学品超过250种。

“我讲过‘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2018年4月，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痛心地说。

又岂止长江？

本世纪初，全国重要河湖遭受不同程度污染，七大江河水系中，超过一半的监测断面为五类或劣五类水，约3亿农村人口饮水不安全。

几十年间，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与“大招商”“大开发”相伴的，常常是有河皆干、有水皆污。

环境问题，最直观的是水，感受最突出的是大气，最不容易觉察的是土壤。

江西东北部的鹰潭市，有亚洲最大的铜产业基地。上个世纪80年代，大量铜加工厂兴起，2000多亩良田成了不毛之地，甚至一些村民体内重金属超标。30年后，重度污染区域的3个村庄、558户村民不得不整村搬迁，离别世代居住的故土。

2016年，江苏常州“毒地”事件引发公众恐慌。常州外国语学校迁入新校区后，陆续有学生出现皮炎、流鼻血等症状。事后调查发现，这里曾是化工厂，土壤及周边环境已严重污染。

成为“世界工厂”时，中国也成为汞、铅、镉、砷、铬等生产、应用和排放大国，大多数污染排放物进入土壤。

危及粮食、危及健康、危及下一代……一起起污染事件曝光后，人们发现，脚下这片土地危机重重！

89岁的曲格平，原国家环保局第一任局长。他也许是中国环保界得奖最多的人，却从未因此开怀过。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中国就开始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伴生的环境污染问题角力。治污，凝聚了几代人的奋斗。

“在中国找一件最困难的事干，可能就是环保！”

老人的声音微微颤抖。

一个刚刚基本解决温饱问题、还有大量贫困人口的中国，一个人均自然资源大都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中国，一个为“站起来”“富起来”而不得不在发展和环境中艰难选择的中国，面临的生态环境压力，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

打开中国地图，**一条从黑龙江黑河到云南腾冲的“胡焕庸线”，展现了生态环境“家底”**——这条线东南方，生活着全国94%的人口，环境压力巨大；这条线西北方，自然条件贫瘠，生态系统脆弱。

河西走廊，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通道，靠的是与之相依的祁连山滋养。半个世纪以来，祁连山先后经历过砍树、开矿、建水电站、搞旅游四轮大规模开发。上世纪九十年代采金、挖砂高峰期时，仅张掖一市就有824家矿山企业，其中770家在保护区。

靠山吃山，山真的会被吃空。

先发展、后治理，这条常规道路发达国家走了上百年。其间，还向外部转嫁了大量污染。

而对中国，历史不再如此“仁慈”。脆弱的生态家底叠加巨大的发展体量，这条老路走不起，也不能走！

这是彰显使命担当的必答题：破解人与自然的亘古之问，以坚毅和果决向污染宣战

“中共施政纲领把生态文明建设单独成章，这在全世界执政党中罕见。”

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党的纲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引人注目。

大会刚结束，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莫里斯·斯特朗就捕捉到这一重要动向。

一个月后，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首赴外地考察时发出告诫——

“走老路，去消耗资源，去污染环境，难以为继！”

时间走进2013年。这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作出振聋发聩的连续发问——

“如果仍是粗放发展，即使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那污染又会是一种什么情况？”

“在现有基础上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总量增加一倍，产能继续过剩，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态环境？”

“经济上去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大打折扣，甚至强烈的不满情绪上来了，那是什么形势？”

一个月后，他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题正是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郝吉明是这次集体学习的授课老师之一。

他记忆犹新：就在那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真正下决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

身为中国环境科学的领军人物，郝吉明并不受一些人喜欢。有企业老板曾对他说，你一句话我就得追加上亿元投资预算，受不了。

“这是历史担当，也是庄严承诺。”郝吉明说。

历史担当彰显执政的情怀，兑现承诺考验智慧和谋略。100多天后，“大气十条”——《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出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系统治污的第一个行动计划**，中国也成为全球第一个大规模开展PM2.5治理的发展中国家。

随后，原环境保护部与31个省份签署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各地立下保卫蓝天的“军令状”。

2015年，“水十条”——《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出台。2016年，“土十条”——《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出台。自此，**气、水、土污染治理的立体作战图全面绘就**。

2017年末，“大气十条”终考临近。为确保完成任务，河北对污染传输通道城市石家庄、廊坊、邢台等10地下达“调度令”，要求重点行业错峰生产。“调度令”就是命令。以往在抗洪抢险等危急时刻才用的手段，第一次用在了治污上。

这年冬天，“大气十条”任务圆满收官。蓝天成为许多人微信朋友圈的“常客”。大气污染防治第一仗，“干得漂亮”！

然而，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生态环境仍是最有可能“拖后腿”的短板之一。

2018年6月，一份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下发的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出炉，提出到2020年三场关键战役的作战目标：**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着力打好碧水保卫战；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

克非常之役，须非常之举。只有断了旧发展模式的利益链，才能真正有生态环境保护的新天地。

2019年初春，陕西秦岭北麓，冬雪渐融，生机萌动。昔日违建别墅成片的大山，正在恢复曾经的容颜。从西安出城往南几十公里就是这块重要的生态屏障。上世纪90年代以来，山林中不断冒出一栋栋别墅，好山好水成了私家风景，开发乱象屡禁不止。

这件事，习近平总书记作出6次批示。2018年7月，中央派驻专项整治工作组与当地展开联合整治行动，上千栋别墅被陆续依法拆除。

祁连山生态环境破坏、浙江千岛湖违规填湖、新疆卡拉麦里保护区“缩水”给煤矿让路、宁夏一企业向腾格里沙漠排污……每一件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事件，中央都紧抓不放，不论多大的利益、多大的保护伞，一抓到底，决不手软。

既以雷霆手段追责，也铺就制度化轨道护航——

2018年7月，广东汕头市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班子领导决定：班子成员轮流到练江流域汕头段的臭水边驻点抓整治。

练江是全广东污染最严重的河。当地纺织、印染、电子拆解等小企业遍布，大量生产、生活废水直排河道。此前一个月，中央环保督察组在这里看到，河水如墨、垃圾粪污漂浮。

“你们市领导可以在臭水边盖几间或租几间房，和老百姓住在一起，直到水不黑不臭。”督察组的尖锐批评让汕头市领导面红耳赤。

几个月后，沿河村民注意到，练江一天天在变化，臭水沟没那么臭了。

建立中央环保督察机制，以现职或近期退出领导岗位的省部级干部为各组牵头人，不仅督察企业，更督察党委政府，这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两年多时间，中央环保督察实现全覆盖，累计问责超过1.8万人。2018年，中央环保督察开展“回头看”，又对20个省份杀了个“回马枪”。

直戳痛点！一大批地方党委政府不作为、乱作为被点名通报；

较真碰硬！一大批怠于履责、弄虚作假的领导干部受了处分；

严格执法！一大批无视环保法规的企业被下令整改、处以重罚。

几年来，从新修订“史上最严环保法”到制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生态环境的法治大网越织越密；从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到生态保护红线等，40多项改革让环保法规制度成“带电的高压线”，形成有力震慑。

承诺如山，使命必达。

中国共产党执政体系上的各层“链条”高速运转——

北京西直门南小街115号，生态环境部。2018年9月，29封特殊信函从这栋灰色建筑“飞”往全国。收信人是29个省区市的省长、主席、市长。给这么多地方领导密集写信，所为何事？

为了老百姓的“水缸”。这29个省份的饮用水水源地环境整治任务仍需快马加鞭——在饮用水水源一、二级保护区内，都有不同程度的水污染隐患，如排污口、违法建设项目、违法网箱养殖等。信中把当地整治进展和存在问题一一列出清单。截至2018年底，这项工作的当年任务已如期基本完成。

建立协作机制、出台配套政策、开展集中治理、强化专项执法、启动应急联动、动员群众参与……整个中国迅速行动，为碧水蓝天不再是奢侈品而拼搏。

“历史上我们还没有发现其他国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这样大幅减少污染的例子。”长期研究全球能源政策的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格林斯通这样评价。

道阻且长，行则必至。治污攻坚正在路上，世界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和担当。

这是上下同心、负重前行的攻坚战：每一地都是战场，每个人都是战士，每一份努力都是为了更加美丽的中国

“当时特别委屈。一分钱没装到自己口袋里，怎么说抓就抓了呢？”

2017年，甘肃张掖市巨龙铁合金有限公司负责人闻斌，因为企业违法排污“进去了”。刑事拘留了一个多月，闻斌出来后一度不愿见人。

痛，而后醒。企业开始一笔笔偿还欠下的“环保账”：投入1380多万元改造环保设施，新建扬尘控制和除尘净化设备，安装烟气排放在线监控系统……

厂区门口，竖起了两块大牌子：一块，介绍当初的污染和被罚情况，自曝家丑；另一块，是整改前后的对比。

痛定思痛的还有临汾人。这一年，1200多人的誓师大会上，人们发誓要“革煤的命”——治！工业企业投资上环保设施、进行深度治理；关！环保达标无望的企业关停；拆！5000多台燃煤小锅炉结束了历史使命；改！10多万户家庭烧散煤的土锅炉改气、改电。

关停禁烧可以立竿见影，经济转型却需苦练内功。外地投资者一听说这里污染动不动爆表，随时可能面临限产停工，往往会摇摇头放弃了想法。

再难，咬着牙也得干！

2018年1月，临汾市长刘予强让人把被约谈内容做成视频，在全市干部大会上播放。自揭伤疤、再戳痛点，就是为了“知耻而后勇”。

读懂临汾的重生之难，才能读懂中国经济的转型之艰。

“要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环境污染综合治理、自然生态保护修复、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等方面采取超常举措，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

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山西考察，指明保护环境之道。

“必须脱胎换骨，此外无路可走！”这句话，已如刀如锲，刻在临汾人心里。

清除大气中的雾霾，先要清除头脑里的“雾霾”，这是比经济转型更难的攻坚——

近40公顷沿海滩涂给了企业开发房地产，违法围填海项目被叫停，煮熟的鸭子眼看就要飞了。辽宁绥中县政府情急之下出“昏招”：编造假公文应对上级检查。

破除“唯GDP是真爱”的政绩观，“发展经济和治理污染是跷跷板两头”的发展观，环保“一刀切”的懒政、怠政、庸政，必须来一场思想上的自我革命！

2015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出台，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情况被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

2017年，第一份由绿色发展指数衡量出来的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结果出炉，北京、福建、浙江、上海、重庆位列前5名。

2018年，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全面推开，任期内所在区域森林、矿产等自然资源资产是多还是少了、好还是坏了，离任时都要算清“责任账”。

“不简单以GDP论英雄”的要求，一步步成为硬约束、真激励。

有一种“断腕”，是必须舍弃唾手可得的利益“蛋糕”。2016年，宁夏开始全力整治贺兰山，最让人头疼的是要关掉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的86家采矿企业。

利益有多大，反扑就有多强。有干部抓治污被诬告，有公安局长被跟踪，有盗采者把头抵在执法车前威胁……

可是，不改不动，贺兰山不答应！

你看那山，表皮被露天采煤层层扒开、到处开膛破肚。山下的石嘴山市，常年笼罩在烟尘中，像硝烟弥漫、惊心动魄的战场。

公检法机关接连起诉几个“硬骨头”，形成整治的排山倒海之势。国有大矿含泪炸掉了矿井，小规模盗采盗挖一个个被抓。

贺兰山里还有上亿吨煤，够躺着吃几十年的。宁夏人咬咬牙说：**“不挖了！”**

封堵矿洞、回填矿坑、拆除建筑、植树种草……两年后的夏天，人们播下的草籽已经长出两寸来高的小草，脆嫩的绿意宣示着新生。

有一种“断腕”，需要丢掉眼前的饭碗，舍弃习惯的岗位。2017年4月26日，河北霸州新利钢铁有限公司，人们聚集在一起，静静等待着。

春风和煦，太阳明晃晃地照着。公司炼钢高炉停炉熄火那一刻，6800多名员工心痛不已。

“钢铁市场形势正旺，日进斗金啊！”副总经理侯振国哽咽了。

可是，只有放弃眼前的，才有未来更长远的生计。当地政府通过企业分流、推荐就业、政府购买公益岗位、支持自主择业创业等方式尽力安置职工。阵痛中，没有一个人上访告状。

2016、2017两年间，全国化解了1.2亿吨钢铁过剩产能，“地条钢”被全部取缔。能源结构在改善、过剩产能在化解、落后产能被淘汰……以高质量发展为新的追求，中国经济正在发生蝶变。

有一种“断腕”，是要离开熟悉的家园，重新定义人与自然的距离。2018年6月的一天，古渡缘客栈房主李龙担心的消息被证实——房子的一部分在洱海保护线内，必须拆除。

洱海是云南大理人的水源。1996年，洱海蓝藻大爆发。此后十多年，这里餐饮客栈“井喷”，建筑“围湖”，洱海深陷环境危机。

2016年，大理人开始抢救性保护母亲湖。

以洱海为中心，当地划出蓝、绿、红三个生态保护圈，分别代表湖区、湖滨带和保护区核心区。圈内，1800多户人家要搬离。

面对拆迁通知，李龙沉默半晌，说：“小病不治会成大病，拆！”

尘埃落定后，这里将重归洱海。

攻坚的战场上，有汗，有泪，也有血。

2017年6月9日上午，四川资阳市环保局总工程师刘应举胸闷不适，机关医务室的医生要求他马上去医院。

“能不能让我把事忙完，下午再去？”他请求医生先打一针。然而，由于大面积突发心肌梗死，刘应举的生命永远定格在这一天。

2018年12月1日傍晚，浙江温岭市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副大队长陈奔在调查环境违法案件时，被犯罪嫌疑人驾驶车辆冲撞拖行2公里多，不幸牺牲。再过6天，就是他30岁的生日。

倒在攻坚战场上的还有：张敏，山东济南市长清区环境执法二中队队长，50岁；吴建华，广东惠州市惠城区环保分局局长，56岁；岳平，海南生态环境保护厅副厅长，52岁；史新宇，湖北武汉市环境监测中心高级工程师，44岁……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2019年新年第一天，汾渭平原多个城市又陷“霾”伏。此后，西安、咸阳、渭南、临汾等地重污染天气持续长达一周，7个城市再次拉响“红警”。从1月10日开始，汾渭平原再遇重霾。这一次，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也加入进来。包括北京在内，多个城市空气质量爆表。

不是一场冲锋就能把红旗插到山顶——**不少城市空气质量仍未达标，一些地方饮水安全仍有风险，土壤污染治理仍需破题。稍有松懈，攻坚的成果就有可能得而复失**。

战斗正未有穷期——这是强起来的中国必须跨越的关口，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啃下的硬骨头。只有秉持新发展理念，我们才能蹚出生态与发展互促共进的新路。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60多年前，一曲《我的祖国》唱出这片土地的深沉辽阔之美。

今天，亿万中国人正以上下同心的执着和坚定，一步一个脚印，向着美丽中国的明天前行。 **（记者陈二厚、董峻、高敬、王立彬、熊争艳、张辛欣、刘诗平、杨静、魏飚）**

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

本报全国代印城市：北京、上海、天津、杭州、金华、宁波、福州、南京、济南、武汉、西安、成都、郑州、哈尔滨、长沙、贵阳、广州、南昌、重庆、合肥、兰州、银川、昆明、南宁、沈阳、长春、太原、石家庄、乌鲁木齐、呼和浩特、海口、拉萨、西宁、青岛、喀什、无锡、徐州、台州